

东亚经纬

2023年第1期

【本期要目】

◆观察与思考.....	1
太宰治《惜别》中的弃医从文叙事再探（徐利）.....	1
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现状（尹虎）.....	8
东北亚海洋环境合作的破局之道（娄燕春）.....	12
日韩关系的缓和及新发展（尹相国）.....	16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付丹丹）.....	20
◆学术动态.....	25
◆征稿启事.....	29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2023年3月31日

太宰治《惜别》中的弃医从文叙事再探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徐利

中途岛海战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逐渐由劣势走向败亡。1943年11月5日至6日，日本操纵的“大东亚会议”通过“大东亚共同宣言”，宣言中的五条纲要被简化为“共存共荣、独立亲和、文化昂扬、经济繁荣、世界进步贡献”五原则。会后，为加大宣传效果，内阁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委托作家以五原则为主题创作小说、戏剧、诗歌等作品，策划了“基于大东亚共同宣言实现大东亚建设纲要的文化协助方案”。由于申请者众多，为便于选拔，该方案规定作家“每人提交2至3页的小说梗概”。1944年2月3日，太宰治参加了“大东亚五宣言小说执笔候选人协议会”，因提交的“《惜别》的意图”之写作计划入选，负责创作体现“独立亲和”原则的命题小说。

由于前述《惜别》创作缘由的复杂性，时至今日，对于该小说的执笔意图，学界尚难形成共识，在此试举代表性研究进行概括：浦田义和提出了“御用文学”与“私人的文学”的解读框架，强调太宰治个人创作意图对国策的抵抗；权锡永则着眼于小说中的时局用语暗含的时代批判，试图挖掘出太宰治以小说为媒介的抵抗。与两者相对，赤木孝之指出，在小说《焰火》被全文删除的不利处境下，太宰治为寻求创作的机会和便利条件而积极迎合内阁情报局的“大东亚共同宣言”策划案，表现出利用时局的姿态。

概而言之，围绕是否“以艺术为媒介抵抗”，研究者对《惜别》的创作意图及太宰治的战时姿态存在几乎完全相反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政治与文学的复杂关系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因，但研究者各自对抵抗的不同标准也是分歧形成的重要原因。如川村湊所明言，“《惜别》是一种以小说对时局的间接抵抗，在创作本身已不可能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为创作小说而利用一切机会的行为”。因此，突破抵抗与否的价值判断，考察极端语境下太宰治的精神世界与创作心态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时代走向与个人命运的关联切入，探究《惜别》弃医从文叙事的内在逻辑。

一、文学救国:太宰治对鲁迅弃医从文的“共鸣”

1944年4月1日,太宰治在随笔“讨厌艺术”中写道:“在鲁迅的随笔中有此一段:‘以前,我曾倾注热情书写攻击支那社会的文章,那实在是无聊。支那社会对我的攻击一无所知,我真是太傻了。’读到此处时,我不禁笑出声来,我谈论电影或许会得到与此相似的结果吧”。在后文中,太宰治提及描述人间情怀的艺术电影《无法松的一生》和日本生产战士“驱赶美英走狗——重庆间谍”的国策电影《来自重庆的男人》,表达了“讨厌艺术”的艺术观。他认为“‘无法松的一生’无聊透顶,‘艺术性’的努力让人觉得老套”。与此相对,《来自重庆的男人》“没有模仿既往的杰作,而是执着于追求想要表达的现实[……]有日本电影中缺乏的纯粹的新鲜感”。这里的现实与艺术的对立值得注意,一方面,战争时期严苛的出版审查使作家完全失去了创作自由,因此他们大多向时局靠拢,创作国策文学;另一方面,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又激发出文人的为国效劳之情,使其感到国难之下艺术回应现实的紧迫性。

由《惜别》的创作时间可知,这一时期太宰治正在为创作《惜别》而阅读《大鲁迅全集》。同年1月30日,他在写给山下三良的信中说道:“刚过新年,就从文学报国会接到以大东亚五宣言为题创作小说的艰巨任务,虑及这也属为国效力,故将其他事情延后,对此颇费心力”。在太平洋战争末期,面对出版审查、稿费收入、家庭负担等现实问题,太宰治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作家个人)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文学为国效劳面对新的现实。太宰治的这种心态也投影到《惜别》的弃医从文叙事中。在小说结尾,太宰治引用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的“文章不用之用”阐释周君由政治转向文学的原因。在论及“文章不用之用”时,他记述了一个关于遭难者的故事:濒临海难的遭难者在千钧一发之际,抓住灯台窗沿,获得一线生机。但当他为是否应该打破灯台守一家团圆的氛围而犹豫时,汹涌的海浪将他吞没。通过这一故事,太宰治表达出作家应该记录“不为人知的事实”的文学观,认为这是驱使周君弃医从文的原因。

经笔者考证,遭难者的故事也见于太宰治1944年创作的随笔“一个约定”。在故事的最后,太宰治写道:“在最前线作战的诸君,请安心!诸君在某时、某地那无人知晓的美行,一定会经一群作家之手,如实且毫无保留地传诵于子孙后代。日本文学史三千年来如此,今后也会毫无变化地继承那一传统”。显然,这样“一个约定”是太宰治写给前线日本士兵的镇魂曲,他以遭难者的“美行”为其所做出的牺牲赋予美学价值,并强调记录这种“美行”是日本文学史三千年未变的“传统”。1940年,日本举办了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的纪念仪式,以宣扬“皇统两千年”。此处的“三千年”显然是在此基础上向前追溯到了“皇祖”诸神创造日本的神代。1936年,在随笔“古典龙头蛇尾”中,太宰治则坦言“传统是自信的历史,是日复一日自力更生的积累。日本的骄傲是天皇,日本文学的传统在天皇御作的诗歌中根深蒂固”。可以说,太宰治所说的“日本文学的传统”指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文学史。1944年12月,在随笔“植根于日本文学传统之物”中,太宰治也表示,“至今日本文学还是欧美第一主义,日本文学作为日本文

学有不能追随其他国家文学的优点，我的目标是扎根于日本文学的传统”。由上述创作于不同时期的随笔，可以发现战争时期太宰治民族主义文学观的大致轨迹。

国民连带感与责任意识是太宰治定位文学效用、阐释鲁迅弃医从文的情感因素。此时期，太宰治文学在题材上频频涉及战争和日本社会。在处理鲁迅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同时，太宰治自己也在直面政治与文学的问题。尾崎秀树认为：“太宰治未能通过描写过去的自己，使《惜别》成为佳作。那也是由于他对鲁迅的理解水平低下造成的，因为鲁迅之‘政治与文学’与太宰治之‘政治与文学’呈现出完全隔绝的状态”。不过，相较于中国文学研究家的鲁迅思想研究，太宰治的弃医从文叙事毋宁说更接近于文学重构，具有强烈的主观意图。与小说中周君的祖国遭受列强侵略相似，在太宰治创作《惜别》时，日本本土也正遭受美军猛烈的轰炸，两者在救国这一语境上产生了虚假的相似性。1945年2月11日，太宰治在写给堤重久的信中提到，“最近正在创作关于鲁迅仙台时代的长篇小说，估计再有十日就会完成[……]已经身无分文[……]炸弹落下来，我就会死吧”。可以说，在以文章理解鲁迅思想的同时，他也因饥饿、被轰炸、濒死等战争体验对弃医从文产生基于实感的体会，这未必是对鲁迅思想转变的正确认识，但却是他切入弃医从文叙事的契机。对于太平洋战争末期的太宰治来说，弃医从文不只是需要理解的思想命题，更关乎非常时期文学家的现实境遇与生存抉择。

二、“文化昂扬”：弃医从文的“转向”轴

太宰治以“春花般甘美”褒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又以“秋月般严肃”譬喻竹内好的《鲁迅》。在文体上，将《惜别》定位为“传记小说”，或许是由于他更容易亲近同为小说家的小田岳夫创作的《鲁迅传》。然而，在发表于1956年的“风花雪月”一文中，竹内好认为小田岳夫与太宰治将鲁迅“文章之真实”与“事实”混淆，以“风花雪月的方式处理鲁迅”，并特别指出《惜别》中的周君是“无视鲁迅的文章仅以作者主观看法塑造的鲁迅形象”。

竹内好对小田岳夫与太宰治的批判事出有因。在《鲁迅》一书中，他反对将鲁迅的“藤野先生”“呐喊·自序”等回忆性散文的内容作为“事实”处理。竹内好认为，鲁迅在北京时期形成了终生都难以绕过的“回心”之轴，而“生命的、原理的鲁迅”的产生可以追溯至仙台时代的“解剖学笔记事件”与“幻灯片事件”。在其后的“何谓近代”一文中，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中日近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两种结构不同的文化类型——“回心”与“转向”。“回心”体现为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主体通过抵抗而发生改变，而“转向”则为放弃抵抗、丧失自我主体性的转变。在他看来，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虽起源于胡适，但其最根本的力量是一种从内部否定的原动力，而这一力量的核心便是鲁迅。可以说，竹内好从鲁迅身上发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回心”型文化。

然而，在总结中日两国应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态度时，小田岳夫却做出了与竹内好截然相反的判断。他指出，鲁迅乃至中国在学习西方科学文明时，采取了完全照搬的态度，并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现在、过去、未来的基轴”。若以竹内好提出的概念来概括其观点，便是“转向”。虽然在《惜别》动笔之前，太宰治收到了竹内好的《鲁迅》一书，但在处理鲁迅的思想转变时，他没有选择“竹内鲁迅”式的“回心”模式，而更接近小田岳夫的“转向”。因而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竹内好对《惜别》做出了强烈的批判：“作者将解剖学笔记事件、幻灯片事件作为个别事件处理，对幻灯片事件采取鲁迅中途离座的方式予以轻描淡写，两个事件没有给鲁迅造成应有的打击；因此，他的文学志向是从外部被强加的”。竹内好强调的是解剖学笔记事件与幻灯片事件的关联性，他认为两者一同为鲁迅带来打击并使之体会到屈辱感，在外部力量冲击下，由此屈辱感构成的自我抵抗是建立“回心”之轴所必需的主体性要素，而这是太宰治对解剖学笔记事件与幻灯片事件的叙述所缺少的。

小田岳夫“将日本对西洋文化进行变形、改造的能力视为东亚与西洋对峙的主体性。通过以主体性为标准的比较，小田岳夫赋予了日本在‘东亚共荣圈’的指导地位”，这种中日文化观受到战争时期日本东亚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与此相同，太宰治的弃医从文叙事很大程度上也是宣扬“大东亚共同宣言”的国策文学性质决定的。据太宰治之妻津岛美知子回忆，“《惜别》的意图”草稿的栏外写着“第二项：独立亲和；附第三项：文化昂扬”。可知在构思小说梗概时，太宰治已然将“独立亲和”与“文化昂扬”作为书写鲁迅弃医从文叙事的两个面向。

在“文化昂扬”意图的驱使下，西洋文明已经被太宰治置换为日本的清洁感、洁净信仰乃至使日本近代走向歧途的“教育敕语”与“军人敕谕”。太宰治使周君从田地、工厂街（即便黑烟滚滚）乃至头顶白毛巾的女人们忙碌的姿态中窥见这种清洁感，使其“瞬间理解了神国的精神”。为营造周君与日本人的亲和图景，太宰治有意塑造了一个幼童形象，在写给参加日俄战争的伯伯的信中，年龄不过10岁的她竟然吐露出源自“军人敕谕”第一条的“为天皇陛下、大日本帝国尽忠”。对此，周君却表达了激赏之情：“‘为天皇陛下尽忠’说得多么坚决、诚挚。日本思想都集中于‘忠’这一观念。”由此，太宰治借周君之口宣扬“神国”优越性的意图昭然显露。从文化优越性的清洁感到“忠于天皇陛下”的军国主义宣传，太宰治使日本成为弃医从文的关键性中间要素。促使周君发生转变的已然不是解剖学笔记事件与幻灯片事件所带来的屈辱感，而是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为天皇陛下尽忠”的精神。当“文化昂扬”的主体——日本，替代西洋成为弃医从文的外部条件时，太宰治只能选择“转向”之轴而非竹内好所说的“回心”之轴，来叙述周君的弃医从文。

三、“近代的超克”：从医学—文学到西洋科学—日本精神

由《惜别》初版副标题“医学学徒时的鲁迅”，可见太宰治对鲁迅与医学的关系尤为关注，而构思草稿也显示他在鲁迅弃医从文思想转变处“颇费苦心”。从结构上看，《惜别》整体以弃医从文为框架，小说开始与结尾处使周君以“我”（小说的叙述者田中卓）为对象，展开了两次篇幅较长的告白——松岛告白与雪夜告白。松岛告白以鲁迅的“朝花夕拾”与“呐喊·自序”为材料，使周君吐露出医学救国的志向——立志成为“支那”的杉田玄白（日本兰学先驱）。而在雪夜告白中，周君则否定了医学救国志向而立志成为“支那”的赖山阳（《日本外史》著者，太宰治将其奉为日本精神的先哲）。两次告白在结构上对称、内容上呼应，是弃医从文叙事线的两个端点，周君弃医从文思想的形成过程囊括其间。然而，作为弃医从文诱因之一的幻灯片事件却被排除于这一过程之外。在雪夜告白之后，太宰治便借“我”之口否定了弃医从文与幻灯片事件的关系：“第二年春，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幻灯片事件’。但我认为那并非周君的转折点，而只是他注意到体内不知不觉变化着的血液的契机。他绝不是因为看了那幻灯片而突然立志于文学的”。这一结论并非来自切实可感的实证研究，而是源于文学家太宰治别有意图的臆想。

在否定幻灯片事件影响的同时，太宰治却将“旅顺陷落”对周君的刺激置于关键地位。据太宰治之妻津岛美知子回忆，太宰治在赶赴仙台查找资料时，特别调查了“仙台第二师团的出征、活跃、战胜祝贺的集会”等情况。小说也确实呈现出“旅顺陷落”时仙台市民一同庆贺的“盛况”。在庆祝集会当晚，周君也被拉出来，“微笑着”参加了日本学生的提灯笼游行。不过，“旅顺陷落”却为周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冲击”，使其“惊呆了日本不可思议的力量”。以此为契机，周君开始重新研究日本，在发现“日本具有国体的实力”后，转而强调：“明治维新绝非兰学者们推动的，兰学不过是路旁的奇花而已，国学才是维新思想的源流”。他认为：“万世一系的皇室庄严地治理日本，这一真正的神国姿态才是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就在周君吐露此番所悟之后，太宰治便借“我”之口叙述道：“受日俄战争中日本大胜刺激而得到的这一发现，极大地打击了周君的医学救国志向。我认为这是他人人生方向突然改变的最初原因”。以发现“日本国体优越性”为契机，周君对科学的认识也被颠覆：“俄国是一个科学发达的国家。无疑拥有许多应用了最高深的科学知识的武器。旅顺要塞也是以西洋科学的精髓构筑起来的。那不也被日军几乎徒手攻陷了吗？”虽然日本所用也皆洋枪洋炮之西洋科学，太宰治却将日俄战争视为西洋科学与日本精神的对决，继而得出日本精神战胜西洋科学的结论。

在松岛告白中，周君认为：“日本迅速地觉察到科学的暴力，进而学习科学以保卫自己的国家。这不仅没有使国风混乱，还成功地消化了科学，让日本得以作为东洋最聪明的独立国家而崭露头角”。在他看来，明治维新的成功并非仅源于学习西洋科学，更有赖于日本手握玄妙的“幽玄”思想之玉，吸收并改造了西洋科学。周君借此批判清政府没有勇气面对西洋科学，他继而强调，“支那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必须抛弃自我陶醉，同西洋科学的暴力作战”。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学”之后始终连缀“暴力”二字，而“暴力”一词在1947年“大日本雄

辩会讲谈社”版《惜别》中被分别改为“实力”和“威力”。从带有谴责意味的“暴力”到中性的“实力”“威力”的措辞调整，可以窥见他原本对科学暴力性的控诉。

其后，太宰治更是对鲁迅“电的利弊”一文借题发挥，直接批判了以爱迪生为代表的美国：“美国人的科学观不健康，是歪门邪道。[……]我认为发明家爱迪生是世界级的危险分子。以原始形式存在的快乐，不在少数。因为酒进化为鸦片，支那遭遇了什么？爱迪生各种各样应用于娱乐的发明，难道不会变成与之类似的结果吗？”。太宰治对爱迪生及其背后的美国将科学应用于娱乐的谴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言论界批判“鬼畜美英”及其代表的近代物质文明的套话之一。1942年7月，河上彻太郎等人以《文学界》杂志为阵地，召开了“知识性协作会议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会议议题以追问西洋近代的“文艺复兴的近代意义”开始，以终结性议题“近代日本的可能性”卒章显志，由“科学的近代性”“科学与神的联系”“美国主义(Americanism)与现代主义(Modernism)”等议题可见，科学、美国以及现代主义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在会前提交的“应该打破什么？”一文中，电影评论家津村秀夫指出：“作为文明利器，电影本身是现代必需之物，作为美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与收音机同等重要，但将之导入国民生活中时，方案稍有纰漏，就会被美国主义的魔药吞噬”。他通过批判美国电影这一现代主义而否定了科学精神。在讨论“科学的近代性”议题时，西洋史学者铃木成高也指出，在希腊古典、基督教、日耳曼精神、科学精神这四个欧洲传统中，科学是形塑近代的根本之物。因此，“‘近代的超克’必须想办法解决科学的问题”。由此可见，批判科学是1940年代日本批判西方近代话语的重要表征。

太宰治对科学的批判一方面指向了美国现代主义，另一方面则体现为通过弃医从文之医学(西洋科学)与文学(日本精神)的思想关系重新评价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的维新凭借的确实不是科学的力量。以水户义公编撰《大日本史》为开端，契冲、春满、真渊、宣长、笃胤，还有编撰《日本外史》的山阳等一群著述者的精神启蒙拉开了维新的序幕。明治维新的奇迹得以发生，是日本因为没有把“物质”的安慰与娱乐作为教化的手段。利用科学拯救本国国民非常危险，是西洋人以侵略为目的征服他国民众的手段。应该将教化本国国民置于启发民众精神的首位。

在此，医学救国志向被作为“物质”的“教化手段”放弃，而强调忠于天皇的“忠义一元论”则被作为“精神教化”的依据。太宰治以弃医从文的思想结构为基础，借周君之口肯定日本精神而否定西洋科学，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了重新评价，表现出与“近代的超克”座谈会与会者相同的思想症候。可以说，“近代的超克”是受日本与美英开战冲击的日本知识人的集体性心情，竹内好则称之为操控了战争时期知识人的象征符号：“‘近代的超克’是所谓近代史中难以逾越之难关的凝缩。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

西洋，这些在传统的基本轴线中所包含的对抗关系，到了总体战争的阶段，面对解释永久战争的理念这个思想课题的逼迫，而一举爆发出来的，便是‘近代的超克’的讨论”。太平洋战争的战局转换使日本近代进入至暗时刻，在此情境下，太宰治为回应“大东亚共同宣言”的“独立亲和”与“文化昂扬”原则而将弃医从文作为思考与重述日本近代的方法，他借周君之口对“复古与维新，尊王与攘夷，锁国与开国，国粹与文明开化，东洋与西洋”诸问题进行了重新阐释。在“旅顺陷落”后，受到日本国民“爱国精神”冲击的周君发现明治维新的成功原因不在于兰学而在于国学，由此，弃医从文中医学与文学的关系也被置换为兰学与国学乃至西洋科学与日本精神。丧失了民族屈辱感的周君被作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叙述者，在太宰治的操纵下以中国近代之不幸肯定了日本近代，继而“超克”了西洋近代。

韩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现状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尹 虎

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既强大，也失衡。占据全球七成市场份额的内存产业让韩国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在非内存领域，韩国只有 5%左右的市场占有率。内存市场频繁的景气变动和价格波动，以及日韩贸易摩擦时日本对韩国进行的半导体材料出口管制，让韩国政府和三星等企业充分认识到发展非内存业务的紧迫性。韩国意欲在 2030 年前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三星计划到 2030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逻辑芯片制造商。雄心勃勃的韩国半导体产业，将走向何方？

一、内存王国的建立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DRAM 产业经历了三次重构。1974 年以前，英特尔、德州仪器、IBM 等美国企业掌握了绝大部分的 DRAM 专利，仅英特尔就占据了全球 DRAM 超过 80% 的市场份额。1976 年以后，以东芝、日立、三菱为代表的日本企业实现专利反超，拿下 DRAM 超过 90% 的市场份额。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韩国企业异军突起，三星、海力士长期占据 DRAM 销售额 Top2，两家企业在 DRAM 的市场份额超过 70%。韩国企业在 DRAM 产业的崛起，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所谓“天时”，是指韩国企业抓住了美日半导体竞争的契机，在美国的技术转让和市场准入方面取得优势。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为遏制日本 DRAM 产业的发展，向产自日本的 DRAM 产品征收了 100% 反倾销税，降缓了日本 DRAM 产品的发展速度。

美国支持韩国发展存储器产业，是希望针对日本培养一个新的竞争对手，来抑制日本存储器产业的发展。为此，美国仅在三星 DRAM 业务的崛起过程中对三星存储器产品象征性征收了 0.74% 反倾销税，三星因此获得相较于日本企业的竞争优势。

而“地利”是韩国半导体走出的“政府+财团”的运营模式。在韩国半导体产业起步前期，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企业的建厂、研发以及收并购，并先后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韩国高级科学技术研究院、韩国电子技术研究所等众多科研机构，聚集核心力量，快速突破技术难关。在发展存储器的过程中，韩国政府为三星、SK 海力士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即便在存储器下行周期，企业也能够凭借资金方面的优势脱颖而出。

同时，三星半导体及 SK 海力士有着韩国四大财团的基因，得以在 DRAM 的景气变换中保持稳定的研发投入。三星背靠三星集团，SK 海力士前身为现代集团旗下的现代电子，之后收购了

LG 集团旗下的 LG 半导体，又于 2012 年被 SK 集团收购。财团背景为三星及海力士提供了资金保障。

“日本产业链信奉市场经济，但存储器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如果亏损了就停止投资，就跟不上最先进的水平。日本的 DRAM 就陷入了认为这个产业不赚钱，继而不投资、更不赚钱，最后只能卖掉的局面。三星、海力士背靠财团，资金实力比较强。加上韩国财团敢于决策、敢于投资，且韩国的大型半导体公司只有这两家，财团的资金支持能够集中在它们身上，为 DRAM 产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人和”是三星、海力士的决策层采取了积极的经营策略，为 DRAM 和 NAND FLASH 拓宽了市场通道。

“‘价’和‘量’，一定得有一个先走出去。NAND FLASH 一开始成本很高，按照市场经济很难做起来。三星觉得发展 NAND FLASH 要先有量，于是先把价格降下去，提升市场普及，让客户觉得好用。如今 SSD 已经实现普及，三星也成为 NAND FLASH 市占率最高的企业。”盛陵海说。

二、着力发展非内存业务

在打造了“内存”这项长板之后，“补短板”也被韩国半导体界提上日程。据《韩国先驱报》信息，韩国半导体在非内存或系统集成电路的占有率只有 5%。“非内存”业务正在成为韩国企业抵御内存景气浮动的压舱石和寻求盈利多元化的出发点。

除了在 DRAM、NAND FLASH 做到市占率第一，三星还在晶圆代工和 CIS 做到了市占率第二。其代工业务起步于 2005 年左右，基于高端定位、技术投资以及与客户企业的合作开发，三星抓住了通信产品迅速发展的东风，实现了技术赶超。目前，三星和台积电是唯一竞逐 5nm 及以下最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三星基于 GAA 架构的 3nm 芯片计划 2022 年上半年量产，2 纳米芯片预计 2025 年批量生产。在 CIS 方面，三星率先推出超 1 亿像素 CIS 和 2 亿像素 CIS，在为手机等移动端提供 8K 超高清创作能力的同时，也适用于高清分辨率的车载环视影像系统或后视摄像头。

同样，海力士也在发力芯片制造与 CIS。其代工子公司“SK 海力士系统 IC”具备 8 英寸晶圆代工能力。今年 10 月，海力士表示将收购韩国晶圆代工厂商 Key Foundry，并期待此次收购将使其目前的 8 英寸代工能力增加一倍。在 CIS 领域，海力士已经有超过 10 年的布局，并以培养增长支柱和进入第一阵营为目标，持续提升研发和生产能力。

但也需要注意的是，三星和海力士发展非内存业务，是业务级别的拓展，而非产业环节的拓展。在材料、设备等上游环节，韩国半导体一度被掣肘。2019 年，日本对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三种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进行出口管制，使材料、设备产业的短板受到韩国政府的空前重视。

为提升材料、设备本地化程度，韩国政府积极推进相关本地企业的自研、自产、自销。三星、海力士、LG 等头部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导入本地企业的氟化氢。同时，基于企业和研究院的联合攻关下，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等机构推动实现了显示屏光刻胶的商用化，以降低对日本材料产业的依赖。

三、参与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的重构

对于韩国半导体产业来说，2030 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未来十年内，韩国将斥资约 4500 亿美元，建立集半导体生产、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和尖端设备、设计等为一体的高效产业集群，在 2030 年前构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导体产业供应链。而三星也计划到 2030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逻辑芯片制造商。要在十年时间建成拥有最大逻辑 IC 制造商的最大半导体供应链，韩国需要做成两件事：建立完善的半导体产业集群，在与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竞争中获得胜利。

目前，韩国在产业链的制造环节中拥有发展优势，三星、SK 海力士占据着全球存储器前两名的交椅，同样三星在先进晶圆代工领域的市场份额也是排在全球第二，仅落后于台积电。杨俊刚表示，在技术层面，韩国打造完善的芯片制造基地有很大的可能性。日本对半导体材料的出口管控事件，也推动韩国积极打造本地化的半导体供应链，避免外部因素导致产业发展停滞。

“建设‘K-半导体带’的关键在于市场，韩国半导体产品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需要借助海外市场。目前，韩国半导体在原材料、零部件、设备和尖端设备、设计等领域的实力和世界最先进水平有一定差距，需要快速突破、尽快追赶。面对全球贸易景气不定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因素，需要加快建设，以克服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影响。”

即便韩国能在十年之内建成相对完善的半导体产业集群，要从“完善”走向“最大”，仍非易事。作为全球半导体服务体系最为成熟的地区之一，中国台湾地区形成了包含多家代工、封测企业的产业集群。而韩国半导体产业可谓“成也 Top2，败也 Top2”。只有两家大型企业的局面，让韩国可以通过“政府+财团”的模式集中支持两家企业在 DRAM 产业的突破，但也限制了产业集群的发展。

“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规模效应和服务体系能解决客户的绝大多数问题，但韩国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盛陵海说，“三星、SK 海力士两家大公司的出现，也让其他韩国半导体企业很难成长到同等规模。一旦出现市场机会，两家公司会很快反应过来去做，留给其他半导体公司的大多是规模小或者利润低的市场，做好了还有被收购的可能，很难形成媲美中国台湾地区的半导体产业体系。”

“政府+财团”模式，让韩国在 DRAM 领域取得显著优势，培养了两家跻身全球销售额前十的半导体企业，也推动了韩国在材料、设备等领域的本地化发展。但这个模式将推动韩国半导

体走到怎样的高度，能否如愿在 2030 年再攀高峰，还难以预知。毕竟，半导体的市场走向不会被任何国家的任何运营模式左右，半导体产业链和构成和协同模式，也将在后摩尔时代发生变化，为全球半导体格局带来新的增长和挑战。

(本文是 KOREA FOUNDATION 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东北亚海洋环境合作的破局之道

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娄燕春

关于日本政府决定将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一事，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认为，尹锡悦政府事实上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共同民主党方面因此对此提出批评，并表示将阻止日本“排污入海”。一些韩国网民也在韩媒相关报道下表达了对政府态度的不满。由此可见，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与政治社会产生联系，若东北亚国家难以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推进合作，将给该地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稳定带来诸多不利影响。因此，本文以构建中日韩三国间海洋合作关系为出发点，重点分析东北亚地区海洋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与应对路径。

海洋环境治理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单一国家与地区难以承担来自整个污染领域的治理任务，需要国家间展开治理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衍生出的种种问题也给三国带来新的考验。

一、东北亚地区海洋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

（一）机制内部的“权力”与“利益”之争

日韩两国之间也存在着对于环境治理的“规范性力量”的竞争，这种“规范性力量”与国家权力密切相关，是一国根据其国家实力来塑造国际规范与标准的能力。日韩在海洋环境治理方面拥有积极的意愿与充足的能力，那么双方在合作机制下必然会对海洋治理话语权与权力展开争夺，不可避免会对该地区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韩国与日本加大在区域合作机制内部的竞争消耗了内部合作的资源。例如在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内两国分别设置了驻釜山与富山的办事处，也称区域协调中心（RCU），因此日韩两国拥有在四国政府会议（IGM）之外的行动决定权。这样的竞争必然会导致机制内部的相互掣肘，同时消耗双倍的行动资金，仅在2020年至2022年间，区域协调中心的预算的涨幅就达到了28.3%。

另一方面，日韩之间的竞争也频生机制功能重叠和缺乏协调的现象。东北亚次区域合作计划（NEASPEC）由韩国外交部发起，而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TEMM）由韩国环境部发起，两者由于活动范围的相似性而彼此功能重叠。相关国际组织在东北亚海域也启动类似的合作项目，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管理的黄海大型海洋生态系统（YSLME）项目与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就在黄海海域的治理中存在功能重叠现象。

（二）中日韩的海洋环境治理的合作机制缺乏效力

国际层面上，主要依赖国际法来为各国的环境保护行动提供合法性解释，现有的国际法对于海洋环境保护虽然拥有相对明确的论述，但缺乏“硬法”的强制性与约束力。这导致凡涉及跨国家环境治理的问题面临“无硬法可依”的状态，尤其是领海海域的监测与治理极易引发国家主权与海洋领土管理权的争执。

区域层面上，中日韩现有的区域环境机制仍有诸多不足之处。中日韩海洋环境治理的合作机制大致包含区域行动计划、政府高层会议、政府间合作计划以及双边的合作论坛、会议与行动等，整体来看三国之间的合作机制仍然以政府间集体倡议为主，缺乏统一的规制与法律，“软法”因素作用明显。该区域内许多环境合作机制是论坛、会议的衍生品，缺乏专门化治理与技术支持，仅仅充当了战略上以及学术、普及性层面的合作框架。

（三）“疫情时代”外部因素对中日韩海洋环境合作的负面影响

由于 COVID-19 的影响，海洋医疗与防护废弃物的排放量迅速增大，个人防护设备（PPE）的生产和使用急剧增长。虽然这些医疗用品提供了重要的病毒保护，但一次性塑料个人防护用品的不当处理导致了塑料污染的激增。由于洋流的作用以及海洋的延伸性与流动性，中日韩海域相邻的国家所带来的海洋塑料废弃漂浮物往往积累在大量的海洋回流中，其中一个回流就是所谓的“大太平洋垃圾区”。该回流对中日韩三国所处的西北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巨大海洋环境威胁。另外，海洋塑料垃圾以及废弃物常常会被海洋生物误食，严重破坏了海洋脆弱的生态环境系统，威胁到沿海居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疫情时代”下环境保护组织的动员能力弱化。由于疫情的影响，国际间交流、协商以及会议的模式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为了减少疫情传播的风险，各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缩减了线下会议的议程，许多非紧急性的会议都暂缓开展。在 2020 年 5 月份举办的联合国一日本基金会校友网络虚拟培训系列会议上，各国代表谈及了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海洋治理的影响。其中菲律宾代表就提到大量的会议只能通过线上来进行，严重影响了科研工作者的学术交流与相互学习，许多环境保护组织的培训计划以及交流项目都被迫推迟。正是由于各种环境保护项目、跨国科研论坛、政府与专业人员培训班以及交流活动数量的减少和形式的虚拟化，导致中日韩三国的环境保护行动力减弱。

二、东北亚地区海洋环境合作的推进路径

（一）转变海洋治理模式

传统的海洋环境治理模式是一种环境管理模式，注重于管理技术，政府规制以及产权划分对环境问题的影响。这种治理模式相对刻板，难以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环境治理挑战，并且与全球治理的流行趋势相背离。如今的海洋污染仅仅依靠个别国家或者区域性国际机制是难以应对的，这就对构建“相互包容”治理机制，调动机制单元的能动性提出了更高需求。中日韩三国需要明确包容开放的格局思路，以参与式管理突出地方知识的重要性和公众参与的环保的力量。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

第一，加大海洋环境合作在民众间的宣传力度。未来三国间的多边合作机制可以探索有关于民间环保科普方面的，举办类似于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NOWPAP）所支持的大学生清理海岸、跨国间志愿者捡拾海洋垃圾的活动，并可以将活动的范围向科学化和普及环保知识的层面发展。另外中日韩三国间还需要加强在科研机构的合作，探索建立类似于南海研究院（NISCSS）、筱川和平基金会海洋政策研究所（OPRI-SPF）、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KMI）的智库沟通渠道；

第二，注重与地区组织展开合作。中日韩三国各自拥有大量的环境保护组织，涵盖联合国资助性质、民间集资性质、政府指导性质以及青年学习性质等不同组织，若能调动这些组织在各自领域的优势，提升横向交流与信息交换，将会极大限度提升这些组织的行动力；

第三，加强与私人企业与跨国企业的合作力度，在环境治理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东南亚和东亚，许多私营公司从事各种环境保护的业务活动，为减少海洋污染做出贡献。例如旨在维护海洋航运环境健康的菲律宾绿色航运—绿色港口—绿色造船厂（GGG）倡议，就在本国航运企业的支持下不断推进。

（二）完善海洋环境治理合作机制

中日韩三国可以深度借鉴欧美在环境治理中的经验，从法律法规与顶层设计方面加以改善。中日韩之间虽然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差别，但在经济发展、文化认同以及科技转化等合作要素上具有相似性，因此可以借鉴“综合+分立”的治理模式，针对合作机制内部法律法规的约束力不足问题加以改进。可以在基本的多边合作框架下，加入议定书形式的规制、明确具体环境污染治理的附件、订立环境污染的责任负担原则来增强区域内成员的责任意识。另外中日韩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还需要建立一定的监督与惩罚机制，尤其对个别国家公然违反国际海洋法的行为必须有所制约。

这一点需要学习欧盟的做法，在已有的合作基础上尝试建立环境领域的综合决策部门，构

建东北亚地区在环境治理领域的委员会、理事会顶层部门。这些部门需要对各个成员国的海洋利用行为进行长期的监督，在同一标准的前提下对个别的违反海洋环境保护法与规制的行为进行惩罚。中日韩三国还可以加强渔业部门、海事管理部门与海洋监管部门的合作，实现跨国家间政府部门合作、跨国家间跨部门政府合作。通过多方联动，信息交互与统筹管理等方式促进海洋环境治理模式的完善。

三、加强“中日韩”三方角色在海洋环境治理的作用

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中日韩领导人会晤中提出了以“中日韩+X”合作模式推动东北亚地区经济繁荣的倡议。这是中国把握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东北亚区域合作发展和自身站位的判断，也是基于目前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和主要驱动力量的判断。“中日韩+X”与周边国家可以将治理 COVID-19 带来的环境问题作为合作的切入点。

第一，建立成员国之间有关疫情的信息联动平台，通过疫情防控的信息共享来推动东北亚地区的防控合作；

第二，针对疫情所带来的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及时制定相关应对政策。尤其是针对医疗废弃物、一次性个人防护设备（PEE）的限制性排放，避免此类的塑料废物直接排入海洋而造成环境污染或病毒蔓延的风险；

第三，积极与世卫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展开磋商与对话，共同商讨针对公共卫生与环境治理领域应对风险的措施；第四，丰富海洋区域治理文件，制定并更新有关疫情防控的法律与监督框架。例如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关闭陆地上的所有非法倾倒场，防止医疗废物进一步非法倾倒入海滩，海洋和河流中。

面对东北亚地区海洋环境治理的诸多挑战，中日韩三国之间应继续深化区域利益共识，在各国海洋战略中寻求环境治理的共生点，拓展治理主体范围空间，增强环境合作机制的约束力与危机反应能力，规避地区争端与冲突的风险，提升中日韩之间的协同力度与合作步伐。并且以海洋环境治理为契机，推动其他海洋合作领域深入发展等。当然中日韩的海洋合作仍然处于活跃的互动之中，各国的独立行为也难以预测，该地区突发的环境卫生事件与日俱增，因此需要进一步跟踪研究。

日韩关系的缓和及新发展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尹相国

2023年3月16日，尹锡悦偕夫人金建希赴日进行工作访问，与岸田文雄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会谈。除国际会议的场合之外，这是自2011年以来韩国总统首次专程访问日本并参与韩日首脑会谈。会上双方同意重启“穿梭外交”，岸田文雄承诺适当时机回访韩国。

从韩国政府3月6日发布二战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解决方案，到随后的尹锡悦访日，韩日之间十余年的紧张关系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迅速“融冰”。作为回应，日本解除了对韩半导体出口管制，《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也恢复正常。

韩日近年来的许多纠葛的核心是二战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这一核心障碍一旦消除，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这次韩国单方面让步，没有给日本造成任何负担，日本自然积极响应。

尹锡悦出访日本的当天，有二战强征劳工案的原告就韩国政府发布的赔偿解决方案提起诉讼。尽管如此，尹锡悦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明，不会对被告日企进行追偿。吃下定心丸的岸田文雄满脸笑意，16日晚邀请尹锡悦夫妇先后在两家餐厅用餐，并准备了尹锡悦喜爱的蛋包饭，尽显地主之谊。一夜之间由冬入春，韩日间的“暖意”为何突如其来，之后是否会面临“倒春寒”，或许有迹可循。

一、蛋包饭外交

过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邀请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东京银座的顶级寿司店用餐。餐后，安倍对日媒说，奥巴马告诉他“这是我一生中品尝过的最棒的寿司”。安倍的待客之道因此被广为称道。岸田文雄此番宴请尹锡悦似乎在循着前任的老路，多家日媒刊发了以“蛋包饭外交”为题的报道。

据日媒报道，16日，首脑会谈和联合记者会结束后，岸田文雄夫妇和尹锡悦夫妇先后抵达位于东京银座的寿喜烧餐厅“吉泽”，该店已有近百年历史。当晚9点多结束第一餐后，岸田和尹锡悦又单独前往位于银座的西餐厅“炼瓦亭”，一起吃蛋包饭。席间，尹锡悦提议品尝韩国的烧酒，岸田文雄在尝试之后称其具有“韩日友好之味”。

一夜两宴颇不寻常。据《每日新闻》报道，尹锡悦的父亲曾在日本一桥大学留学，尹本人此前在日本吃蛋包饭时印象深刻，称之为“回忆中的味道”。日本方面得知这一信息后，根据尹锡悦的喜好安排了这一餐。日本外务省官员称，如此安排晚宴是为了让双方领导人更好地了解对方，这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

然而在韩国国内许多人看来，“蛋包饭外交”俨然是一种羞辱。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 17 日称，“韩国卑躬屈膝向对方乞求和解，这副嘴脸真可悲。他们（日方）用一碗蛋包饭换来所谓的正义，换来趾高气昂和受害者的人权历史。”

3 月初，韩国公布的二战强征劳工赔偿问题解决方案，由第三方代替被告日企赔偿，这是两国之间纠缠已久的分歧点，尹锡悦顶着国内舆论反对的压力做出了让步。詹德斌指出，对日本来说，尹锡悦是个值得合作的人。尹政府力推韩日关系改善，实际上是一种认知转换，保守政府有强烈的亲美、亲日倾向，与进步政府相比，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不同。尹政府认为日本不是威胁而是伙伴，在安全、经济方面需要与日本展开合作。

此次会晤中，韩日商定将加紧讨论加强安全、经济、人文交流等多领域合作，将重启长期中断的韩日安全对话和韩日副部级战略对话，并建立“韩日经济安全对话”机制。在应对朝鲜问题方面，尹锡悦特别提到了他启程访日的前一天，朝鲜试射弹道导弹，强调韩日、韩美日合作应对朝鲜的重要性。

韩国西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金在淳指出，日韩两国现在有了合作的势头，将会加强针对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的防御和威慑，保护和促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并强化经济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韩日首脑在会晤后的记者会上都提到了中国。岸田文雄表示，韩日政府商定在诸多领域活跃沟通，并就其具体方案之一“尽快重启韩中日高级别交流”达成共识。尹锡悦也表示，韩日中在保持联络的基础上，将在经济领域具有共同利益的方面进行合作。韩联社称，停摆三年多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能否重开备受关注。

尹锡悦提到中日韩经济合作，说明他希望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微妙的平衡。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的财界商界，想要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的余地越来越小，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北亚的形势会更加不稳定。不过，对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还是有期待的，这期间若有意外的突发事件就很危险，因此还要观其言、听其行。

二、“隐藏”的谈话内容

尽管日韩首脑共同出席了记者会，谈及一系列会谈成果，但是双方并未发表联合声明。关于会谈内容的全貌，韩国方面有“难言之隐”。据日本时事通信社报道，岸田文雄在首脑会谈上要求韩方切实履行 2015 年双方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议。岸田文雄当时作为日本外务大臣主管协议签署事务。就此话题，韩方会后却一字未提。据《韩民族日报》报道，当记者就日媒报道追问韩国总统室，会谈内容是否涉及慰安妇问题时，总统室的一名高官避而不答，称“大部分讨论都是关于发展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

韩日政府于 2015 年 12 月达成《韩日慰安妇问题协议》，次年 7 月根据协议成立“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然而，文在寅政府上台后提出重新谈判协议内容，基金会于 2018 年解散，《慰安妇协议》事实上已成一纸空文，韩日政府围绕此问题的磋商进展缓慢。

尹锡悦访日营造出融洽氛围，自然不愿被双方分歧破坏。而且，日本政府未就二战强征劳工问题做出直接明确的道歉，韩国国内不满情绪上升，有网友称尹锡悦访日为“屈辱外交”。在此背景下，尹政府对于信息发布更显谨慎，恐刺激民意，但终究难掩两国之间的未解之结。

对尹锡悦而言，由于今年韩国没有国政选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又选出了清一色的“亲尹”领导班子，因此国内的负面舆论暂时难对他构成太大威胁。从现在开始直至年底，尹政府能否拿出韩日关系改善的具体成效，对于说服民意至关重要，因为明年 4 月的国会选举将是一个“审判日”。

目前，日方回报中最主要的一项是对韩半导体管制措施，韩国国家安保室长金圣翰 16 日评价其为“重大成果”。但是詹德斌表示，从统计数据上看这一制裁对韩国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日本并没有停止对韩出口相关产品。无论从双边半导体领域还是芯片联盟的合作，这一措施的象征性意义较大，自此双方就可以讨论合作，韩国可以尽快融入调整中的半导体供应链，否则日本可能会抢占优势。

事实上，此次韩日互动中的一些所谓“成果”的内在并不充实。比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和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 3 月 16 日宣布，双方出资设立“韩日·日韩未来合作基金”。《韩民族日报》称，该基金是为配合两国首脑会晤而仓促设立的，在没有确定具体项目和参与企业的情况下启动。16 日上午突然通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发布会现场没有桌椅，记者们只能站着或坐在地上采访。

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有关人士表示，“韩日·日韩未来合作基金”相关的联合文件调整还需要一些时间。实际上，韩日关系改善也难一蹴而就，还有更长的路要走。蔡亮认为，现在韩日之间的高层政治热度，实际上是尹锡悦方面的“一头热”，美国的力量也只能让日韩高层去做政治弥合，但日韩之间的诸多矛盾涉及到许多问题纠缠不清，包括历史问题、领土冲突、民族恩怨，双方关系有反复的可能性。

韩日关系改善的前景，最大变数实际上来自日本。韩国政府的意志是确定的，而日本首相如果在考虑自身执政的需要去迎合右翼，采取一些偏右的政策，比如参拜靖国神社等，都会刺激到韩国，韩日关系立即就会“冷冻”。

三、向美国“交差”

韩日关系在这个春天急速解冻，背后有着尹锡悦对美“交差”的一番盘算。3 月 6 日，韩国

政府公布二战强征劳工赔偿方案，第二天美韩双方就分别官宣，尹锡悦将于4月26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脑会谈。这将是尹锡悦第三次与拜登举行首脑会谈，也是韩国总统时隔12年对美进行国事访问。

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琳·让-皮埃尔7日表示，拜登总统将为到访的尹锡悦举行国宴，庆祝美韩同盟70周年，并强调这将是拜登上任两年多来第二次以国宴招待外国元首，上一次国宴招待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韩日关系拉近，美国乐见其成。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6日表示，“美国当然会继续支持两个国家朝着持久进步的方向努力”。美日韩三边伙伴关系是“维护和推进我们建立一个更安全、更有保障、更繁荣印太地区的关键”。下个月，尹锡悦将带着韩日关系改善的成果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

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首尔与东京化解分歧，以强化美日韩三国的同盟力量。蔡亮说，韩日关系改善，从大环境来看是拜登上台重整同盟，从小处看则是尹锡悦的亲美立场明晰。美国想要在“印太”发挥影响力，东北亚的同盟国中相对更加依仗日本，那么美国就希望韩国在一些问题上对日本做出让步，改善韩日关系。

日本人已经给了美国想要的大部分东西，在许多层面来看，美日都是模范盟友。斯坦福大学美国亚洲外交政策专家丹尼尔·斯奈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道。就近期来看，日本去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回应了美国的要求。在俄乌冲突问题上，日本也紧紧追随美国步伐，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

当然，韩国对美也有所表示，比如去年推出了韩版“印太战略”，现在又大力改善韩日关系。詹德斌认为，韩国加强对日关系，有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上的多重目的，但是在经济方面显然不想排斥中国，因为中韩贸易额是显而易见的。日韩首脑此次都提到了中国，韩日关系改善，中日韩在一些三边问题上的合作肯定要比过去好一些，毕竟消除了日韩关系不佳的负面因素，而且中国也希望推动三边合作，有利于地区一体化。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 付丹丹

中国政府已经把共同富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当前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就以共同富裕问题为首要问题。就实现共同富裕，中央指出，要先把蛋糕做大做好，再把蛋糕切好分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充分考虑目标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认为，其它几个问题，包括如何对待资本等，都是围绕着实现共同富裕来展开的。因为我们国家已经把共同富裕放到最高的政策议程上，共同富裕将会是明年党的二十大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了邓小平先生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过去 40 多年里，我们促成了 8 亿人口脱贫，即脱离绝对贫困；在十八大以来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 1 亿多人口脱贫。那么，下一步怎么走呢？无论从国际局势来看，还是从国内形势来看，共同富裕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问题。前面 40 年，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成为组织政策的轴心，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国家政策肯定是围绕共同富裕来组织的。

一、“乡村”概念的内涵

那么，共同富裕对中国的乡村振兴意味着什么？很显然，乡村的共同富裕必须要通过乡村振兴来实现，而乡村振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需要我们做全方位，甚至立体式的考察。

首先，乡村振兴需要对“乡村”这个概念做比较深刻的哲学思考。中国的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在继续进行，且会以非常快的速度进行。如果认为乡村总有一天会消失，或者认为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坐在这里讨论乡村振兴的问题。但是，即使我们的城市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即达到 70% 的水平，我们仍然会有四五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今天，我们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尽管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一直是农耕文明，我们大多数的父辈也是农民，或者像我们自己一样刚刚从农民的身份转换成为城市身份，但我们已经觉得自己不是农民。我们想把农民的身份远远抛在身后，甚至有些人看不起和鄙视农民。我想，抱这种态度的城市居民多得是。从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也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说的“贫穷社会主义”时代，农村是贫困的象征，落后的象

征，那个时候大多人的梦想是脱离农民的身份，甚至从城市下乡的知识青年都有“回城梦”。无论是农民想进城或者知青想回城在当时都是一个朴素梦想。

从世界范围，尤其从欧洲近代文明看，英文“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跟城市是有关系的，city 和 civilization 是有关联的。但如果看看欧洲的历史，欧洲人并没有把乡村或把农村看成是落后的；相反，近代以来很多哲学家、思想家把农村视为文明的载体，他们会为乡村的衰落而悲歌，为乡村的振兴而振臂高呼。

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从欧洲开始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比较欧洲的城市化和中国的城市化？如果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问，欧洲有没有像中国那样的超大城市呢？没有。欧洲有没有那么多人去推动城市化或城市群的建设呢？也没有。德国是欧洲城市化非常高的国家，但是德国到今天为止将近 80% 的人居住在 2 万人左右的小城镇。那么，是不是欧洲人没有能力建设大城市呢？我想欧洲人建设大城市的能力不比我们差，像巴黎那样的城市到现在为止数百年的地下基础设施都不用更换，而我们的城市设施几年就要更换、重新维修。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对城市和乡村的不同哲学思考。在欧洲，小城镇也是城市化，而我们是鄙视乡村的。我们很多人喜欢到欧洲旅游，尤其是到欧洲的小镇，但回到国内照样鄙视乡村。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的可悲之处。

还有日本的例子。有人说我们的超大城市化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密度过高。我觉得这说不过去，因为大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并不矛盾，只要方法对头。日本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远比我们高，城市也在扩大，东京现在已经集聚了日本三分之一的人口，但是日本的乡村建设怎么样呢？我们去过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的乡村是非常美丽的。“三农”在中国是一个问题，但是在日本是相反的。

我们的城市化在某些方面是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第一波工业化是牺牲农村为代价的，户口制度、城乡二元对立是第一波工业化的结果。改革开放的第二波工业化也是这样，“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概念，农民工是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他们几乎是城市化和城市建设的主体，但是他们享受不了城市化的利益。在这些年里，光是我们珠三角每年就吸收了 3000 万农民工。尽管我们做了很多努力，但直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户口制度所带来的问题。

农耕文明随着城市化在快速消失，但是我们还没有创造出城市文明。我们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明呢？城市文明的大多数因素都是通过现代化甚至借鉴西方而来的。我们看看大城市的建筑就知道。今天中国的各大城市充满着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人说中国是最大的世界上后现代主义的试验场。很显然，这不是中国本身的传统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中国领导人强调“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指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这不是中国的现代化，而是西方的后现代化。

十八大以来一个最大的理论贡献就是终于搞清楚了中国现代化的含义，中国的现代化并非

西方化而是中国传统本身的现代化。在理解现代化方面，近代以来我们有深刻的教训。“五四运动”以后的很多人都简单地把现代化理解成西方化，所以简单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不过，各种努力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那么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到今天为止还在强调。这是从失败中学来的深刻教训，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走上了成功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马克思主义都要中国化，那就根本不用说其他西方的主义了。但是，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么很多方方面面西方的东西有没有中国化呢？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照抄照搬西方，连教科书也是照抄照搬。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要强调广义的来自西方的东西的中国化，光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够的。我们要继续谦虚地学习世界上一些好的经验实践，但绝不是要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鞋子合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

对中国现代化的这种认识，十八大以后也反映在乡村振兴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农耕文明的传承发展和提升农耕文明有很多论述，我念几段给大家听，大家可能会深有体会。我自己的体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远远不仅是政策上的指引，而代表着在经历了数十年快速城市化之后对乡村的一种哲学思考。尽管这些论述具有很大的政策指引成分，但主要还是对乡村的哲学认识。大家对乡村的认识水平还是要提高一点高度。

二、农村可持续发展之路

正因为这样，中共十八大以来开启了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十八大以前胡锦涛、温家宝时代已经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且也免去了农业税。十八大以来把整体农村的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共同富裕无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部分，甚至是核心。无论是从欧洲还是日本的经验来看，共同富裕是美丽乡村的经济基础，只有共同富裕才能吸引人和留住人，一个贫困的农村再美丽也跟人毫不相关。以前我们住在农村，景色非常美丽，但是人还是要跑掉。现在中国有很多非常美丽的乡村，但是如果太穷了，人还是留不住。

尽管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很快地推进，但是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共同富裕不仅仅体现在城乡之间，更体现在乡村内部。今天农村面临一个巨大的困局，我个人把它称之为“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农民大多外出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有了钱就到城里买房子，有了钱就把孩子送到城里面读书，留在农村的就只有那些没有能力进城的老人和小孩。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三留守”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我个人觉得进城和成为城市居民还是大多数农民的中国梦。农民的行为属于比较合理的，因为较之农村，城市拥有更多的资源。如何解决“资源单向流出性衰败”这个问

题，需要我们深刻思考。但是，很显然，如果仅仅靠政府的一点投入，不足以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政府对农村的投入是越来越大，也的确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但问题在于，一旦政府的投入减少或停止，很多农村还会重新返贫或者回到旧貌。

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只有实现了城乡的双向流动才能实现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不仅仅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也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富人的乡下，穷人的城市。穷人居住在城市，既是因为城市的就业机会，也是因为城市便利的交通。如果到美国、欧洲去看看，那些低层的人都住在地铁站旁边，因为他们要使用公共交通，但富人不需要这些。我以前在普林斯顿读书，普林斯顿离纽约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很多在纽约工作的富人就住在普林斯顿。穷人需要住在城市中心，但富人不需要便利的交通，因为他们自己具备这些基本条件，并且他们喜欢享受农村的风光。

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启发，那就是要实现城乡的双向流动。进城是农民的“中国梦”，但像我们这样的城市居民返乡也是我们的中国梦。我们必须意识到，“返乡”是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特色。传统社会数千年，乡村治理的主体就是接受过儒家教育的儒生或绅士，相当于今天读了大学回乡的人，他们是农村文化的主体或载体。我们“士、农、工、商”这几个阶层，不管在哪里发了财、当了官，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乡下。中国人即使到了海外，也存有“回乡梦”，落叶归根。

在过去，我们的户口制度、农村土地制度中断了这种传统，但现在看来我们要实现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上层居民返乡的“中国梦”并不难。在很多城市，户口制度已经在松动了。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半，即容许农民成为城市居民，我们还要把后一半也做起来，即容许城市居民返乡，再一次成为农民。

中国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土地制度，即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可以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制度条件和物质条件。监管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用各种制度规则来防止传统社会经常发生的土地集中现象。但实际上，这种现象今天已经不可能发生。这里就是要处理好三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社会资本、农村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政府要规制资本，既应当容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也应当防范社会资本进行传统中那样的土地集中，这个并不难。而只有实现了城市居民的返乡梦，乡村才能拥有必需和充足的资本，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点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观察到，因为只有城市中上层来到乡下，才能建起学校和医院，其它的基础设施也会跟上。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本，农村本身还是会衰败。

城市文明是因为城市拥有城市居民这样一个文化载体，而农村的衰败更是文化上的。我经常到农村去看看，担心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事情，更是农村文化的贫乏。尽管现在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但一到农村，什么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有，低俗文化盛行，甚至邪教也屡禁不止。我觉得政府应当鼓励我们这样的人退休之后回乡。现在 60 多岁就退休了，如果容许回乡，就可以把文化和资本带到乡下去。农村需要拥有良好的教育体系和健康的现代文化。通过城市居民回

乡这样的方式可以实现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和建设。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农耕文化是我国农业的宝贵财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不能丢，而且要不断发扬光大。如果连种地的人都没有了，靠谁来传承农耕文化？村庄空心化和“三留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外在表现是村子空了，本质上是人一茬一茬离开农村。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

学术动态

“东亚日本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成功举行

2023年3月11日，东亚日本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主办，日本名古屋大学与东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协办。本次研讨会分设“东亚的语言与语言教育”和“东亚的文学文化与思想”两个专题版块，全程采用线上方式进行。来自中国和日本的6所高校共60余名专家学者和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盛文忠教授主持，名古屋大学杉村泰教授、东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赵晓临教授分别致开幕词。本次研讨会累计进行学术报告22场，内容涉及中日语言和翻译研究、中日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东亚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日语教育研究等多个领域，学术报告选题彰显了东亚主题与全球视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各领域的前沿课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氛围浓厚热烈。闭幕式由东华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月娥教授主持，名古屋大学杉村泰教授致闭幕词。



本次研讨会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名古屋大学和东华大学三校第九次联合办会，在后疫情时期积极主动推动中日学术交流的一次新的尝试，也是日本研究界深入贯彻落实“双一流”建设战略、促进日语语言文学研究和区域国别等跨学科研究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次研讨会的顺利举行对开阔学术视野、增进国际学术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信息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网站）

浙江工商大学成功举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2023 年年会暨“浙江与东亚”学术论坛

2023 年 3 月 31 日，由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承办的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 2023 年年会暨“浙江与东亚”学术论坛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顺利召开。

3 月 31 日上午，浙江中日关系史学会代表大会暨换届改选会议如期召开。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领导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领导班子成员、理事、会员代表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秘书长许海华主持。

首先，浙江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社科团体处处长郁兴超发表致辞。郁处长对会议的顺利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预祝学会换届顺利完成。他期望新理事会能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和省委的号召，发挥已有优势推进浙江省日本学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同时加强进一步东亚与日本研究下的新课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篇章做出新贡献。

其后，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陈小法为大会致辞。他代表第五届理事会向莅临现场和云端参会的各位代表致以热烈的欢迎和真挚的感谢。他表示学会在第五届理事会的带领下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与省级平台所要求的高标准相比仍有一定距离，祝愿学会能在新理事会的领导下取得更好的成绩。

大会听取并审议了秘书长许海华所做的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随后，大会进入换届改选议程。大会听取了学会第六届理事会选举办法和理事、常务理事候选人组成情况的说明，顺利选举产生了第六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1 名）、副会长（5 名）、秘书长（1 名）、常务理事（17 名）、理事（59 名），并颁发了聘书。

会议选举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兼东亚研究院院长、教授江静为第六届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江静教授表示将以此为契机为学会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也期待学会能成为日本学乃至东亚学研究者的学术共同体，希望学会会员在加强自身学术研究的同时，为浙江文化建设、国际交流做出贡献。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党委书记周宏力作总结致辞。周书记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的情况，并表示学院将全力支持学会工作，与专家学者一起共同推动中日关系史研究，认真落实“四个服务”要求。至此，浙江中日关系史学会代表大会圆满落幕。

3 月 31 日下午，“浙江与东亚”学术论坛如期召开，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文学院教授王勇、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东亚阳明研究院院长钱明、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小法、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吕顺长、浙江工商大学东

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李国栋、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兼东亚研究院院长、教授江静五位专家做主旨演讲，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岳兵担任主持及评议，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徐建新及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峰做研讨会总结发言。



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副院长、文学院教授王勇指出，古代东亚世界存在比翻译更为重要的外交话语体系——汉文笔谈。官方外交文书、外交官笔谈、民间跨国行记、往来尺素中，汉文发挥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关键作用，成为不同国家传情达意的舟楫。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工商大学东亚阳明研究院院长钱明强调“和魂汉才”在日本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文化的“体”和“用”与中国文化有绵延数千年的依存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中日两国文化在精神层面实现了有机融合。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小法讲述中日近代史上不甚为人知晓的人物水野梅晓与中国政、军、商、佛、文艺各界的交往，揭示出水野梅晓的多重身分及其与浙江的特殊关系，引发思考近代中日交流史的复杂面貌。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吕顺长以“近代浙江留日学生”为主题，介绍了近代浙江最早派遣的留日学生、清末浙江留日学生人数及地区专业分布，讲述了近代浙江留学生的事迹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特聘教授李国栋通过良渚玉戍与日本绳文中期翡翠玉戍的互证，提出重要学术假说：4600年前日本古代倭人接受长江下游良渚古越人的族群符号“玉戍”，从长江下游至日本列岛之间出现了一个“内外越”相互认同的“越文化圈”。

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兼东亚研究院院长、教授江静指出，浙江沿海港口是历史上中日僧侣往来的主要门户，浙江名山古寺更是历史上中日佛教交流的重要舞台，浙江文化孕育滋养了日本佛教文化。

主题演讲结束后，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中世纪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徐建新、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对大会发言做总结。两位专家在积极肯定上述演讲之重要意义的基础上，

也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值得进一步挖掘的学术增长点。

在本次论坛中，与会学者们就演讲内容和研究意义等展开深入讨论。为今后“浙江与东亚”的研究提供了发展经验与路径指引。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学术界关于“浙江与东亚”相关研究成果的交流与讨论，更借此契机促进区域间文明互鉴、为实现浙江同各地区文化发展与文化繁荣搭建沟通桥梁。此次大会作为学会发展的新起点，将谱写未来浙江与东亚研究的新篇章。

（信息来源：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网站）

《东亚经纬》征稿启事

《东亚经纬》是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东亚研究院（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主办，面向全国相关机构内部发行的学术季刊。

本刊以研究“东亚学”理论，探讨东亚地区热点问题，分析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走势，传递海内外“东亚学”研究动态及信息为己任，开设“观察与思考”、“名家访谈”、“学术动态”等栏目。

《东亚经纬》不仅是从事东亚研究的各界人士开展学术探讨和交流的平台，也是相关部门了解和认知“东亚学”领域重要研究成果的渠道之一。

为进一步提高《东亚经纬》信息质量和可读性，能够全面反映“东亚学”研究的现状，兹长期征集相关东亚的研究稿件。征稿要求如下：

- （1）稿件要求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内容充实，论证严密，语言精炼，资料详实；
- （2）稿件必须由作者（或合作者）完成，杜绝抄袭。字数以 2000—3000 字为宜，优秀稿件可适当放宽字数要求；
- （3）稿件中如有计量单位，一律采用国际标准，尽量不用图表；
- （4）一般不使用注释，如有引文，可在引文后加括号，注明出处（按作者、文献名、期刊或出版社、年月顺序）；
- （5）附上作者简介，信息包括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本刊收到稿件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阅，并通知作者稿件处理情况。稿件一经采纳，本刊将略付薄酬。

投稿邮箱：youno2014hz@mail.zjgsu.edu.cn

邮寄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 18 号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邮编：310018）

《东亚经纬》编辑部

